

## 40年来中国大陆高等学校学术制度的因革 ——以学术委员会制度为中心

熊庆年

**内容摘要:** 本文以历时的视角, 对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高校学术制度的再造进行了审视, 认为可以分为制度恢复期、法制奠基期、再造觉醒期。2010年后进入再造挺进期, 政府将学术制度的再造纳入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路线图, 健全学术制度成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以制度变迁理论为工具来观察学术制度的再造, 可以发现, 改革的内生性动力动力不足, 高度依赖于外部驱力, 导致了形式大于内容的状况。当前, 中国大学学术制度变迁的内生性动力在增强, 把握好这一机遇, 适时地采取路径替代以促进变革, 将有益于学术制度的加快成熟。

**关键词:** 40年; 中国大陆; 高等学校; 学术制度; 因革

**作者:** 熊庆年,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复旦教育论坛》执行副主编。研究领域: 教育管理、高等教育管理、教育史、大学史。邮箱: qnxiong@fudan.edu.cn

**Title:** Inheritance and Change of the Academic Syste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Mainland China in the Past 40 Years - Focus on the Academic Committee System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storation of academic institutions in mainland China since 1978 from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And thi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the system recovery period, the legal foundation period, and the restoration period. In 2010, during the re-engineering period, the government incorporated into the academic system a road map for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The improvements brought about by these steps hav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Applying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we plan to asses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academic system. We will argue that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reform is insufficient. Instead it is highly dependent on external drive, leading to a situation where the form is greater than the content. At present, there is a strengthening in the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university academic system in China. Seizing this opportunity, together with timely adaptation of path replacement, can bring about change that will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cademic system.

**Keywords:** 40 years; Mainland China;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cademic system; inheritance and change

**Author:** Xiong Qingnian, Director of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Fudan University, Vice-Editor in Chief of Fudan Education Forum. Research areas: education management,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education history, university history. E-mail: qnxiong@fudan.edu.cn

大学组织本质上是学术共同体，学术制度是大学制度的核心部分。研究 40 年来中国大陆高等学校学术制度的发展，对于认识中国大陆高等教育发展的特质具有重要价值。关于“学术制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人们的理解是有差异的。有人把学术制度看作是学术的规范体系。“‘学术制度’的主体就是学术，核心是规范，是在进行学术活动的过程中，认识学术制度发展的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规范，学术发展的过程同样是学术制度形成的过程。”（王丽，2011）有的学者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待学术制度，认为大学教学制度、科研制度和服务社会制度是现代大学学术制度的主要内容。（赖良，2013）也有学者从权利的角度来定义，认为学术制度是“知识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关于生产者以及知识产品、知识产权所有者权利安排规则。学术制度分类为：职称晋升制度（学术薪酬制度）、评奖制度、科研资助制度、发表制度、学术杂志评级度、作品引用制度、教学制度等”。（董希望，2014）也有学者认为，学术制度“是指围绕学术活动而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制度和规范”，是

“学术领域为满足政治和经济需要并由行政所主导的制度安排”。（阎光才，2005）更广义的定义，则认为学术制度“是指人们制定的影响学术生产行为和生产结果的一切规则的总称”。（杨光钦，2015）。为了主题集中和行文方便，本文主要以学术权力组织制度——学术委员会制度为中心来展开研究。因为学术权力组织制度是学术制度的核心构成，无论是规范体系、功能体系、权利或权力体系，都有赖于权力组织制度形态去延展。把握了学术权力组织制度的形态，也就把握了学术制度的精髓。

研究制度的发展，一个常为人们所运用的理论工具就是制度变迁理论。在中国学术制度研究上，这一理论也被用以解释其历史的发展。阎光才指出，“在中国，现代学术制度经历了一个从‘被动接纳’到‘主动赶超’的过程。这种‘主动’姿态背后的主要推手却依旧是政治与国家”。“中国的学术制度建构则具有明显的外部逻辑主导和突变式的制度演进特征。对于一个后起国家而言，这一外在逻辑主导模式是有其优势的，那就是通过国家政治力量，在短期内，实现对学术资源的高效整合。当然，从长远的观点看，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意识形态和行政力量过度介入的偏向，对于学术活动依其内在逻辑自我展开的理想生态环境来说，是有其不利影响的”<sup>1</sup>。

李福华、丁玉霞研究了我国学术制度变迁的制度创新问题，认为“必须改革我国目前政府与大学之间的这种隶属关系，恢复大学作为学术组织所应具有的制度变迁主体的地位，使学术制度创新由完全被动接受政府的制度选择变为重视大学的自主创新，尊重学术制度的自然选择，把诱致性学术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学术制度变迁两条路径结合起来，实现学术制度的创新。”<sup>2</sup>这种阐释是论理性的，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历史语境中加以观察，以证实其客观性。

## 一、学术制度发展的分期

郭卉考察了1949年以来中国大学学术权力制度演进的历史，

- 1 阎光才：《中国学术制度建构的历史与现实境遇》，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27页。
- 2 李福华、丁昌霞：《论我国大学学术制度创新》，《教育研究》，2012年第11期，第58页。

认为 1949-1979 年可划分为一段，特征是学术权力趋于萎缩；20 世纪 80 年代到世纪末为一段，标志是学术委员会出现；2000 年后出现新的变化，学术权力得到发展，标志是基层院系教授会重新出现，但在大学一层尚未建立起体现学术权力的制度和机构。<sup>3</sup>虽然划分较为粗略，但是还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

实际上，1949 年后的三十年中，学术制度经历了再造和摧毁的曲折经历。新的国家政权抛弃了民国时代的政府对高校的规制，1950 年颁布《高等学校暂行规程》，把学术事务归于校务委员会，<sup>4</sup>开启了学术权力附属于行政权力的模式。1961 年《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正式提出实施“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sup>5</sup>1963 年教育部在《关于发送直属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工作有关文件的通知》中，更加明确“为了加强学术工作的领导，可以在校务委员会下设立学术委员会，作为学校党委和行政在领导学术工作方面的助手。学术委员会由学术上造诣较深的教师组成，可以对科学研究工作的规划、计划和重大仪器设备的添置进行审议，评审重大研究成果，并研究科学研究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向学校领导提出建议。这种做法，现在经验还很少，可以先在少数学校试行。”<sup>6</sup>在《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工作暂行简则（草案）》中，更明白地规定“学术委员会在科学研究工作方面的主要职责是：审议学校科学研究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研究科学研究工作方面的重要问题，向校长和校务委员会提出建议；评审校内重要学术成果；指导学校学术书刊的编审工作。”<sup>7</sup>由此构成了学术权力组织制度的正式规制。然而，没有几年，“文革”爆发，高校体系整个被解构，初步成形的规制被

3 郭卉：《论我国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演进》。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2009 年，第 9 期，第 1 章，第 726-729 页。

4 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1949-1997》，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年，第 46 页。

5 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1949-1997》，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年，第 1060 页。

6 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1949-1997》，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年，第 1170 页。

7 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1949-1997》，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年，第 1173 页。

完全摧毁。虽然如此，但不可否认，1949年后三十年的曲折实际上为1978年后高校学术制度的再造提供了历史的镜鉴。

“文革”结束到现在的四十年，高校学术制度的再造才有了实质性的推进。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 1、制度恢复期（1978-1989）

“文革”结束，1977年恢复高等学校招生，学术委员会立刻被教育行政部门赋予功能。1978年教育部长刘西尧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明确表示：“高等学校应建立学术委员会”。<sup>8</sup>这可以说是学术制度再造的“复活”。但这种复活并不是简单地照搬过去，而是有新的认识。“成立这种组织，不仅有利于学校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和学术水平的提高，而且便于高等学校，特别是少数著名的重点大学，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同时，学术委员会也可以作为学校的一种咨询机构，有利于贯彻群众路线和发扬民主，更好地发挥一些专业人员的积极作用。”<sup>9</sup>“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在校长或副校长领导和主持下，对学校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科学研究工作和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提出建议，审查、鉴定科学研究的成果，评议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毕业设计，参与提升教授、副教授工作的审议，主持校内学术讨论会，组织参加国内和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等。”<sup>10</sup>人们对学术委员会价值的认识，上升到了新的高度，“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的问题比较复杂，应持慎重态度，不要草率做出决定。学术性质的问题应由学术委员会去处理。”<sup>11</sup>

在政府规制的导引下，部分高校陆续成立了学术委员会。高校学报中最早登载成立学术委员会消息的是武汉大学，该校在1977年12月7日成立了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是在校党委领导下

8 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97》，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614页。

9 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97》，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640页。

10 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97》，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646页。

11 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97》，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914页。

开展群众性学术活动的科研咨询机构，是党联系全校广大专职和兼职科研人员的桥梁。它承担着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力促进全校科研工作深入持久开展的任务。委员会按老、中、青三结合原则组成。在七十名成员中，教授、副教授占百分之四十一.4。学术委员会分设规划、学术活动和成果评审、学报、科研条件等四个组，各系也按上述原则，成立系学术委员会。”<sup>12</sup>从中可以看出，学术委员会的定位是咨询机构，目的是促进科研工作，组成方式是由行政决定的。1978年、1979年零零星星可以看到一些大学学报发布本校成立学术委员会消息，大致可以推断当时成立学术委员会还不普遍。知网上能搜索到的最早的高校学术委员会章程，是1987年12月刊布的保定金融专科学校学术委员会章程。全文9条，加所附学术委员名单共965字。<sup>13</sup>从这份制度文本中，可以看到，委员会成员是由校长提名产生的，功能行使是行政方式的，反映了那个时代高校运行的典型特点。虽然制度化程度不高，但毕竟有了一个雏形。组织的性质、任务、构成、运作等要素都有了。

## 2、法制奠基期（1990-2002年）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深入推进。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颁布，标志着中国教育进入全面依法治教的新阶段。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颁布，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法制的基础。在学术制度再造上具有特别意义的就是，学术权力及其组织制度上升为了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sup>14</sup>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史上，是一个光辉的里程碑。经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曲折，学术权力的地位与作用

12 佚名：《我校学术委员会正式成立》，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第32页。

13 佚名：《保定金融专科学校学术委员会章程》，《金融教学与研究》，1987年第4期，第56页。

14 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2003-2008》，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第154页。

终于成为社会共识，学术权力组织制度终于得到法律上的承认。

正是由于法制建设的推进，为学术制度的再造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前，大多数成立了学术委员会的高校都没有制订学术委员会章程，而高教法实施之后，为学术委员会制订章程陆续成为一些高校的行动。复旦大学在2001年制订了《学术委员会章程》，章程第一条写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二条，特制定本章程”。华中科技大学2001年制订了《学术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第一条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简称《高教法》）的精神及其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我校设立‘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校学术委员会），并制定本条例。”<sup>15</sup>不过，法律上的承认并不能代表学术制度在高等学校的落地生根。事实上，学术委员会在大部分高等学校还只是一个摆设，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不具有实质性的功能价值。2004年新上任的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杨卫就直言：“学术委员会以前是一个荣誉性机构。”<sup>16</sup>

### 3、再造觉醒期（2003-2009）

2002年，中国高等教育比预期计划提前8年进入大众化阶段。高速扩张、外延式的发展，使得高校管理日益复杂，权力配置和组织运行面临种种挑战，制度短缺所带来的弊端日见突出。尤其是处理好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问题，成为重要议题。2003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要依法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明确学校党委、校长、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各种机构的职责权限和议事规则，做到相互配合，权责统一，依法办事。”<sup>17</sup>在此之后，教授在大学治理中的地位成为政策话语。在2008年教育部的一个正式文件中，大学治理结构表述为“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

---

15 佚名：《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2年第1期，第58页。

16 冷凝：《充分发挥校学术委员会教授治学功能——访我校新一届学术委员会主任杨卫院士》，《新清华》，2004年6月18日，第2页。

17 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2003-2008》，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第154页。

学、民主管理的机制”。<sup>18</sup>事实上，尊重学术权力，努力“去行政化”，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公共话语，代表了当时教育改革的一个诉求。

再造学术制度的意识不只是体现政策话语中，更体现在现实的诉求中。复旦大学第五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王迅院士，对于这届学术委员会从成立到换届的10年中只开过两次会，“名存实亡”，<sup>19</sup>耿耿于怀。在换届中积极推动学术委员会制度的改革。在他的努力下，学术委员会章程进行了修改，去除了学术委员会当选资格的等第性条件，明确“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依照民主、公开、自愿原则，由民主选举产生”，“在任的校级党政领导成员不参加校学术委员会，但在需要时可由校学术委员会邀请列席会议”。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术委员会过去“行政化”色彩深厚和有名无实的状况。这种改革的自觉其实是当时舆论普遍呼唤高校“去行政化”社会环境的一种反映。

#### 4、再造挺进期（2010-2017）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颁布，这个规划纲要描绘了中国教育未来十年发展的战略路线图。战略目标很清楚：提高质量，内涵发展，提升软实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被视为重要的政策工具，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要点中，学术制度的建设又是关键点之一。文件明确提出：“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sup>20</sup>为了落实这一战略意图，教育部于2014年1月发布了《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这是1949年以来政府发布的第一个专门针对学术制度的规范文件。2015年12月通过的《高等教育法》修订案，对高校学术委员会的职责进一步做了明确界定。

---

18 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2003-2008》，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第1651页。

19 姜澎，王迅：《固执又顶真的复旦“老四”[N]》，《文汇报》，2011年8月4日，第9页。

20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DB/OL] [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info\\_list/201407/xxgk\\_171904.html/2018-04-08](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info_list/201407/xxgk_171904.html/2018-04-08)

这一法律修订，为学术制度的再造提供了更为完备的法律基础。

在这期间，几乎所有公办高校都依照教育部规程制订或修订了学术委员会章程。有调查表明，截止2018年1月，教育部直属高校除5所外，都在2014年后对学术委员会章程进行了全面的修订，而且篇幅普遍有大幅度增加。《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在2015年完成了修订，新版的章程最重要的修订之一，就是按照教育部规程增加了“运行”一章。规定“学术委员会实行例会制，每学年召开两次全体委员会议”，并规定了会议的召集、秘书处的设置、常务、表决方式、回避、列席、下位组织。<sup>21</sup>增加运行制度规范的意义在于，反映了学术制度由名义性走向了实质化。

## 二、学术制度发展的动力

1978年以来的中国高校学术制度再造，直接的动力，来自于政治功利的考量。“文革”之后邓小平复出，自告奋勇抓教育。他认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因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拨乱反正的开场锣。他在1977年就提出，“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sup>22</sup>“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这点应该定下来。重点大学，都要逐步加重科研的分量，逐步增加承担科研的任务。”<sup>23</sup>成为两个中心，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发展，便成为高等学校发展的基本定位。而学术制度的建设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事实上，两个中心后来越来越向科研中心倾斜。尤其上个世纪末提出“211工程”、“985工程”以后，科研中心实际上摆在了教育中心前面。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术委员会在高校就是当作推动科研工作的机构来对待的，而并非学术权力配置、学术治理意义上的。换句话说，这里所谓的

---

21 《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EB/OL][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xswyh/9982/2015/20151116085753572997899/20151116085753572997899\\_.html/2018-07-28](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xswyh/9982/2015/20151116085753572997899/20151116085753572997899_.html/2018-07-28)

22 冷落、汪作玲：《邓小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67页。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邓小平教育理论学习纲要》，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6页。

“学术”，是狭义的学术，即知识发现的学术。2007年，时任国务委员的陈至立曾经在一次讲话中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教、民主参与的机制，处理好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sup>24</sup>然而，2008年教育部的一个正式文件则表述为“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机制”。<sup>25</sup>后一表述后来成为“标准”的表述，“治教”和“治学”这一字之差，其实大异其趣。在当下社会语境中，“治教”的涵义人们通常会理解为参与学校治理事务，“治学”的涵义通常会理解为处理学问上的事。官方表述最终采用“治学”，可以说反映了学术制度再造的基本出发点是政治功利主义的，而不是学术自治意义上的。

学术制度再造正因为具有政治的工具性，所以，自上而下地推动是其明显的特征。前文所提到的每个分期，都是这样。当然，不单单学术制度再造是这样，高等学校其它制度的改革也是这样。再大一点说，这与中国改革主要靠政府自上而下驱动也是一致的。但是，学术制度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学术活动的规则，是学术共同体的规则，论理该由学术共同体自下而上地建构。那么中国高校学术制度的再造是否有内生性的驱动力呢？可以肯定地说，也是有的。中国南方H大学学术委员会重构的过程就说明，该校并没有把重构简单看作是执行政府政策的一项任务，也没有把重构当作学术委员会的“制度改良”，而是把它看成是牵动整个学术内部的“治理革命”。他们通过“结构重构——组织体系整合推动学术力量的增权”，“将H大学新旧学术委员会进行对比，最为直观的就是学术组织重构牵动了内部治理结构变化，进而推动了学校内部政治权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均衡与制衡。”<sup>26</sup>如果没有学术共同体的自觉和主动建构，光有外在的政策驱动，显然是达不到“治理革命”的境界的。北京大学在学术委员会建设中，也表现出内生性动力的涌动。2004年版的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比较关注各层级、各领域、各主体所应当享有的平等的权利，关注学术

24 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2003-2008》，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第1278页。

25 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2003-2008》，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第1651页。

26 蒋达勇：《学术委员会：使大学治理运转起来——基于H大学治理改革的实证分析》，《高等教育评论》，2017年第1期，第153页。

委员会每个成员在组织运行中所应当享有的权利”。<sup>27</sup> 2014年版的章程曾达7800字，没有公布的“原因是还没有形成共识”，2017年版的章程设置了学生委员、监察制度，<sup>28</sup> 2018版的章程对二级学院学术委员会组织作了更规范的要求。如此种种，反映了北京大学在改革中学术共同体的内生性驱动力。

不过话要说回来，总体而言，学术制度再造中自下而上的内生性驱动力是不足的。2014年《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颁布时，学术界、高校并没有多少反应，曾经让主持制订规程的教育部职能司局的负责人感到困惑。也许他认为，第一个关于学术制度的专门规制出台，学术界和高校应当是欢呼雀跃的。笔者没有科学调查过，凭社会交往的经验判断，不少人认为出台这样的规程没有什么用处。宣言式立法、部门立法的制度惯性，规范性、操作性不足，程序缺失，等等，都会使教师对制度建设缺乏信心。制度供给依赖于政府，导致行政控制导向、行政利益导向，也会使教师产生排斥心理。在长期政府主导、行政权力主导的环境习染下，在高校长期的依附性生存的习惯中，主体的学术自治意识淡漠、权利意识的淡漠，参与公共事务积极性不足，或许是一种必然。正因为内在驱动力不足，学术制度再造出现学术制度形式大于内容的状况，亦是不可避免。笔者对教育部直属高校学术委员会章程文本的调查，可以支持这一判断。采集到的2014年前的41份旧版学术委员会章程，千字以下的7份，千字到2千字之间的17份。也就是说，一半的章程文字粗略，可以想见其规范程序是不高的。即使2014年后的68份新版学术委员会章程，超过《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3678字篇幅的只有31份，不到一半。

人们认为，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各有其特性。前者具有内生性，动力来自基层。后者具有外生性，动力来自政府。外生动力过强而内生动力不足，是学术制度再造的客观现实。如何限制外生动力而激活内生动力，这或许是未来学术制度再造要解决的问题。

27 熊庆年：《清华、北大学术委员会章程建设的治理意蕴》，《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8年第2期，第27页。

28 熊庆年：《清华、北大学术委员会章程建设的治理意蕴》，《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8年第2期，第29页。

### 三、学术制度发展的展望

回顾中国大陆高校学术制度的 40 年因革，不难看到它的进步和发展。首先，人们对学术制度价值的认知在深化。主体的视野慢慢地超越政治功利主义而转向学术活动本身自身规律，尽管这种转向来得有点缓慢，但是毕竟在变化。把学术制度作为大学制度的梁柱，成为法制和政策的现实。最近两任的中国教育行政当局最高负责人都把学术委员会制度作为现代大学制度框架的主要支撑，这是很自然的。2016 年 1 月，时任教育部部长的袁贵仁就表示，“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迈出关键步伐，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核心，以高校章程为基础，以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理事会为支撑的现代大学制度框架基本形成。”<sup>29</sup> 今年 1 月，现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指出：“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以大学章程为基础，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高校理事会相配套的现代大学制度整体框架基本形成。”<sup>30</sup>

其次，学术权力组织已经成为大学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学术委员会作为学术权力最重要的的组织形式，在大学的组织架构体系中已经成为客观实在，而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尤其是，这个组织存在近 10 年来逐渐摆脱了“花瓶”的角色，而变得“有用”了。赋予它应有的权力，发挥其就有的功能，不仅是法制和政策意义上的标的，而且是高校的具体行动。在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运动”中，高校普遍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的规程，建立起了学术委员会实体，普遍制订、修订了学术委员会章程，制度化水平大大提高。学术委员会从“名存实亡”到“名实相称”，这是很多高校正在努力实现图景。

再次，学术权力组织正在开始发挥出其应有的制度功能。有学者调查了 S 省学术委员会制度实施的情况，得出的判断是：“S 省省属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在学术权力的获得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29 袁贵仁：《以新的发展理念为引领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EB/OL）》，2018 年 7 月 10 日，[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176/201602/t20160204\\_229466.html](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176/201602/t20160204_229466.html)

30 陈宝生：《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2018 年 7 月 10 日，[http://www.moe.edu.cn/s78/A11/s6353/201802/t20180206\\_326931.html](http://www.moe.edu.cn/s78/A11/s6353/201802/t20180206_326931.html)

相对没有《规程》时的情况，现在在制度的形式层面都已经基本到位，并且不仅仅在文本层面，而是在形式层面构建了新型的学术委员会组织，并且在运行方面基本按照《规程》的规则在运行。具体指标方面，在回避制度、公示制度和复议制度等层面贯彻得最为到位。在学术道德裁决方面贯彻得最为充分。”<sup>31</sup>《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规定，“学术委员会应当建立年度报告制度”。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教育部直属高校大部分高校都将这一规范付诸实施了。如果仔细考察这些年度报告，不难发现，学术委员会制度大体“落地”了。“落地”才可能真正发挥功能。近年来有关学术失范案件的报道中，我们也很容易看到，高校学术委员会所属学术道德规范机构已经成为调查、处置相关事件的正式组织。这也可从一个视点窥见学术制度建设的功效。

回顾40年的历程，同样也能看到，学术制度再造还在路上，离成熟的制度形态还有很大的距离。“基本形成”是一种官方的判断，这本身也表明制度建设还任重道远。然而，未来还是值得乐观的，因为，中国大陆高校学术共同体的制度自觉意识正在逐渐被唤醒，学术制度变迁的内生性动力在增强。这是最为期待的成长要素，也是克服路径依赖最可能的因素。围绕学术委员会制度的一些争论和不同实践，我们可以看到新因素的萌发。比如，校长和一些行政负责人要不要进入学术委员会？校长是否应当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学术委员会成员名额如何分配？学术委员会委员该如何产生？学术委员会与党委领导是什么关系？与校长负责是什么关系？学术委员会的决定事项的范围是什么？与政治决策、行政决策是什么关系？学术委员会秘书处的设置与运行怎样才是合理的？学术委员会是否应当受到监督？学校学术委员会与院系学术委员会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学术委员会与其它学术权力组织是平行关系还是隶属关系？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校的学术权力组织是不是应当有不同的形态？等等。提出这些问题，是学术制度再造、生成的内在要求，倘若把这些要求适当地转化为制度建设的动能，克服路径依赖并不是不可能。

克服路径依赖，促进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并不意味着

31 冯东：《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指南研究》，上海：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排斥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中国的语境下，传统与文化的制约实际上使得强制性制度变迁更加有效率，因而把两种制度变迁的长处加以激活利用，消解其负面能量，使制度再造的效用最大化，这才是应当去追求的正道。